

Charles Taylor 的觀點

現代社會與

公共性的根源

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的社會想像

王崇名◎著

C91-02
20101

港日書

思想社會叢書

Charles Taylor 的觀點

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根源：

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
的社會想像

王崇名◎著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Charles Taylor 的觀點：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根源：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的社會想像 / 王崇名著.-- 初版.--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7.08 面；公分 -- (思想社會叢書；7)

參考書目：面

ISBN：978-986-6913-37-2 (平裝)

1.社會哲學 2.現代化

540.2

97014881

Charles Taylor 的觀點

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根源：

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的社會想像

著 者：王崇名

出 版：稻鄉出版社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7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I S B N：978-986-6913-37-2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Charles Taylor 於 1989 年出版的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曾經立在我的書架上多年，那時僅僅隨意翻閱幾頁，就再也未曾翻閱，直到六年前（2002 年的夏天）。另一本幾乎一樣厚（大約六百多頁）的 *Hegel*（Taylor 於 1975 年出版），也是受到如此冷漠的對待，伴隨 *Sources of the Self* 靜靜地立在早已過份負擔的書架上。為何要讀它們？我一直沒有太大的動力，當時我正奮不顧身地閱讀 Gadamer 的《真理與方法》與 Heidegger 的《存在與時間》，也都是很厚的經典。那時只是想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嘗試解釋 Weber 的 ideal type，並藉此重新解釋「社會的概念」。在那個時候總覺得從實證主義社會學的角度，也就是被 Parsons 化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的概念」，好像少了些什麼，或是誤解了什麼？當時我一時也說不出個甚麼道理，只能憑藉閱讀 Heidegger 與 Gadamer 的巨著來進行思索。

我一直知道 Taylor 是加拿大人，但是也曾心想加拿大人的哲學與社會理論有甚麼好讀的？在國內的社會學界，很少提及 Taylor，遑論是加拿大籍，當時（至今依然如此）流行的社會理論不是法國就是德國，或是美國。直到我知道 Taylor 是魁北克人，曾經想獨立的加拿大法語區，我便開始

慢慢對 Taylor 的作品產生興趣，我想從他的作品當中理解他是如何思索魁北克獨立的問題。台灣究竟要與大陸統一或是獨立？一直是社會學未曾正視的問題，我想知道 Taylor 做為學者與魁北克人，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在知識與實踐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當我知道他未曾停止關懷魁北克統獨問題時，我開始對 Taylor 的社會理論產生興趣，便奮不顧身地閱讀他的所有作品，從 *Sources of the Self* 一路讀完他所有的著作（書）與部分期刊論文。*Sources of the Self* 我更是讀過八、九次，*Hegel* 也讀了兩三次。

當我完全掌握 Taylor 的思想時，我深深感到驚訝而顫抖。心想：這不就是我試圖追求的知識與所欲表現的學術研究嗎？感到驚訝而顫抖，是因為我竟然可以讀得懂 Taylor 的思維，但是也深深感到難過，作為異文明的我，想要成就原來想要表達的想法，遠遠在 Taylor 之後。他非常用心地理解他自身的文明，包括魁北克與加拿大的關係、以及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整個北美洲與歐洲文明的關連，而且非常熱情地進行各項政治與社會實踐。他對他自身文明理解的厚度與熱情，早已不是異文明的我所能奢望研究的。如果我可以清楚地詮釋他的想法，那已是一種福氣，甚至是「不簡單的」事了。於是乎，我決心以詮釋 Taylor 的學術關懷做為理解西方文明，特別是現代社會的起點（就目前為止，我感覺也是終點了，短期內應該無人可以超越 Taylor）。

過去，跟隨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高承恕教授與陳介玄

教授讀 Weber 與法國年鑑史學的理論與作品，以做為理解西方文明的起點。但是我萬萬沒想到，Taylor 也是以 Weber 為起點，特別是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關聯為起點，也身受年鑑史學影響。這不是偶然，也是必然嗎？讀 Taylor，詮釋 Taylor 看似偶然，但是卻有 Weber 所言的「選擇性的親近」，一種偶然的必然。如果未曾跟隨高承恕教授與陳介玄教授用心閱讀 Weber 與年鑑史學，累積一些社會理論的厚度，我想大概也沒有任何能力閱讀與詮釋 Taylor 的思想。

做為魁北克人，Taylor 對魁北克有高度的關懷，做為歐洲文明之子，他一如 Weber 試圖解釋歐洲文明的可能與限制，高度工具理性的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鐵的牢籠」或是自私而無終極意義關懷的「自戀」。2007 年出版的 *A Secular Age*，應該是總結他一輩子學術研究的成果，當然他依然健步如飛，自 McGill 大學退休後，目前轉任至美國西北大學擔任由董事會邀請哲學系與法律系合聘教授。不過，最輝煌的思想還是早已展現在 *Hegel* 與 *Sources of the Self* 這兩本巨著。以上這三本巨著，以及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1979)、*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1991) 與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2004) 與相關的論文集，未曾停止對於自身所處的文明與人類整體文明的關懷，未曾停止思索；何謂現代社會，以及其同義詞——公共性？

本書若是成功地詮釋了 Taylor 的學術成就，一切都得感

謝美國西北大學退休教授，芝加哥大學史學博士，東海傑出校友許文雄（筆名許達然）教授的鼓勵。但是若力有未逮之處，純粹是作者研究不精，期待讀者不吝指正。本書誕生時，我正臨危受命擔任博雅書院行政長，協助籌辦東海大學博雅書院，那是極為艱辛的時刻，由衷感謝在此階段相輔相攜的博雅書院夥伴們，感謝博雅書院籌備處主任王偉華博士、教育長陳以愛博士、行政秘書琳余與雅暄，以及博雅書院的學長們——特別是「工頭」旭智（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志宇（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生）與曉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生），各位夥伴的相知相惜。目前我也兼任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簡稱就友室）主任的行政工作，沒有就友室同仁采采（家幸）與淑文的分憂解勞，我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完成這本書。由衷感謝在撰寫此書過程，為我分憂解勞的所有同仁與夥伴。

王崇名

2008年夏天

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籌備處

目 錄

自 序	iii
第一章 一個依然未解的疑惑：現代社會與公共性是如何誕生？	1
第二章 為何現代社會要說真話？	55
第三章 公共性的根源：大公「有」私的愛.....	109
第四章 大革命思想與現代社會的想像.....	181
第五章 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根源：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的社會想像.....	217
參考書目	233

第一章

一個依然未解的疑惑：現代社會與公共性是如何誕生？

基於內在自我 (innate self) 的第一人稱激進反思 (radical reflexivity of first-person)、合理化的理性言說 (rationalized logos, 以下簡稱合理化言說) 與現代社會 (modern society) 以及其準同義詞——公共性的關聯, 是本書作者多年來的構想: 試想藉由這本書來論述現代社會與公共性 (publicity) 是存在於合理化言說的對話網絡之中, 而且這是基於第一人稱的激進反思。事實上, Charles Taylor 於 1975 年出版的 *Hegel*, 特別是出版於 1979 年的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已經對於本書所關心與準備闡述的議題提出初步的看法: 藉由對 Hegel 哲學體系的重新詮釋——以哲學詮釋學重新詮釋, 來說明言說 (語言)¹ 與現代社會的關連 (Taylor, 1999: 91)。

¹ Taylor 比較喜歡使用「語言」(language) 而少用「言說」(discourse) 的概念。不過, Taylor 所使用的語言的概念是一種廣義的語言的意義, 包括一般性語言、符號以及各式各樣的對話, 而非一般性的語言的意義。為了避免誤解, 本書還是使用言說的概念。

1989年出版的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以下簡稱 *Sources of the Self*)，更進一步探討內在自我、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的關連，及其對現代社會與公共性誕生的深刻影響。這種基於第一人稱激進反思的合理化言說的對話網絡，到了2004年出版的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Taylor 更進一步稱之為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ies)²。這種社會想像已經做為西方現代社會與公共

² Taylor 的社會理論或是社會哲學 (或總的來說稱為社會思想)，在國內不常被討論，通常被列為政治學的領域，事實上在政治學領域的研究也不多見如曾國祥 (2004)，僅做為政治理論或思想的相關課程的一部份，特別是談到公共性的問題。Taylor 在台灣做為被理解的對象，事實上還是有限，雖然 *Hegel* (1975年出版)、*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1989年出版)、*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1979年出版) 以及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2004出版) 等主要著作分別由中國大陸 (前兩本) 與台灣 (後兩本) 翻譯出版，但是書評或是介紹的文章還是很少，遑論研究以及運用他的社會思想了。這不知是 Taylor 的學術研究不值國內學者重視？還是國內學者對西方社會思想的理解的相對落後？Taylor 的社會思想從以哲學詮釋學批判行為主義心理學開始，經由對於 Hegel 的哲學研究，探討 Hegel 哲學思想與現代社會關係，經由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以哲學詮釋學的史觀，對其自身所處的西方現代文明進行全面性與更深化的研究之後，到了2004年出版的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已經很「社會學」了。他自己也表示若是可以再活有一百年，他願意選則神學、歷史與社會學做為他的主要研究領域 (謹請參閱2007年的3月15日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Philosopher awarded Templeton Prize* 的專訪 Charles Taylor。)。

性的框架，不可逃避的框架，是一種道德的空間，西方現代人所必須棲息的道德空間。這種社會想像——基於個體的社會想像所浮現（emerge）的集體社會想像，是一種藉由歷史實踐所形成的「有重要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藉此一方面彼此進行個體的社會想像；另一方面則不斷地建構集體的社會想像，同時又反過來影響個體社會想像的建構。

可以這麼說，這本書想表達一個想法：現代社會與公共性是誕生於合理化言說的對話網絡之中³，而且合理化的意涵是來自於第一人稱的內在自我反思，那是激進的，不過卻不是主觀的偏見或是神秘的，而是實質的（substantive），是來自於對過份形式合理化或工具理性的反抗。這樣的第一人稱激進反思及其所表達或說出來（articulate）的語言，是一種對於自身慾望與利益的表達，並藉由這樣的表達來關照自我（care of the self），達到承認自身——做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由人自己所決定的人，而非由「他人的」宗教與權威的糾結所決定。基於這種第一人稱激進反思所產生的合理化言說，現代社會與公共性形成了。唯有基於這種可以清楚地陳述自身的慾望與利益的合理化言說的對話網絡，現代社會才得以誕生；也就是說，現代社會與公共性是存在於這樣的對話網絡之中，而且這是一種實踐過程——歷史的實踐過

³ 包括內在的自我對話如 Mead 的「有重要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在內心的自我對話。

程，在此過程個體的利益以及慾望，與整體（現代社會）之間不斷進行衝突與整合，最後朝向個體與整體的同一。不過，Taylor（2004）認為這種基於歷史實踐的言說，是一種社會想像——既是一種基於歷史實踐的理解（的存在），也是一種規範（或框架）。個體與整體之間是一種個體想像與集體想像的融合過程，這正是歷史實踐的過程。個體藉由個體的歷史實踐（個人的生命歷程）參與整體的歷史實踐（整體人類的生命歷程），來想像與理解整體，並做為規範的共同理解基礎，成為 MacIntyre（1981：203-204）所謂的探求（quest），透過探求個體生命歷程的歷史實踐，而逐漸認識到人類整體生命的歷史實踐。不過，Taylor（1989：111）認為這種誕生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歷史實踐過程，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的。

就 Taylor（1989）而言，這樣的想法，就西方思想史而言，最初起源於 Augustine 三位一體（trinity）的神學思想，不過直到近代的德國浪漫主義哲學才正式成為一股全面性的社會實踐力量——從神學轉為哲學並成為一種社會實踐力，成為形成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重要力量。不過浪漫主義哲學的神秘主義色彩，尚未完全脫離宗教信仰，直到 Hegel 的哲學體系完成，這種三位一體的神學思想才真正成為一種哲學，就 Taylor 於 1975 年出版的 *Hegel* 而言，成為一種歷史實踐的理性思辨的哲學（不同於 Kant 的純粹理性思辨）。雖然 Taylor 對於 Hegel 的絕對精神的目的論採取保留的態

度，即便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是他認為 Hegel 的歷史實踐的理性思辨哲學，非常值得做為理解現代社會與公共性誕生過程的理論架構（Taylor，1975）。

基於 Hegel 歷史實踐的理性思辨哲學，Taylor 從 1989 年的 *Sources of the Self* 到 2007 年的 *A Secular Age* 持續延續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的研究——基督教除魅化（或合理化）的過程，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人的自由是來自於新教，特別是英國清教徒的宗教信仰的合理化過程（用工具理性來分解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人被做為「物」（thing）來看待，用工具理性來切割——而非用天主教（舊教）的宗教與權威糾結的支配來對待，人才有機會解開宗教與權威糾結的束縛，成為一個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人」（agency）——具有自我詮釋（self-interpreting）能力的人。這時候的新教徒認為認真地認識（分解）上帝所籌畫的世界，進而認真體驗到上帝的偉大，並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而非天主教傳統的怪力亂神——不敢解釋上帝所籌畫的世界，而任由以羅馬教會為首的天主教會的恣意解釋。新教的宗教信仰試圖回到以上帝所籌畫的世界而非天主教的「人為」的解釋，這股力量推動了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以及形式合理化的發展，試圖回到事物本身的解釋，而非「人為」（天主教教會裡的神職人員）的合理化解釋。不過，這股力量就 Weber 與 Marx，甚至是 Durkheim 而言，都非常擔憂它發展過頭，反過來成為宰制「人」（agency）的自由。

不過，Taylor（1989）延續他對於 Hegel 哲學與現代社會關連的研究，認為第一人稱激進反思一方面形成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化（如 Descartes 的『我思故我在』），並形成指謂性語言（designative language）——簡言之，是一種重視具體分析與指涉的語言（容後第二章詳述）。另一方面卻也因過份形式合理化而引起的內部反抗（矛盾），而使第一人稱的激進反思形成實質合理化的承認自身的力量（如 Montaigne 的思想），並形成表達性語言（expressive language）——這是一種藝術或文學的語言，藉以表現人的內在情感與慾望。就 Taylor 的 *Sources of the Self* 而言，這兩股力量（形式合理化與實質合理化）的相互對抗與相互穿透，並進一步藉由指謂性語言與表達性語言的相互對話，而成爲西方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根源：合理化言說，讓西方人可以說真話或誠實而且成爲一種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首要德行——真誠性（authenticity），他們可以清楚地述說自己的慾望與利益，而這些利益又可以在形式合理化的法律條文裡，形成一種系統，成爲一種有整體性的社會制度。雖然這樣的形式合理化的系統，一度讓西方的哲學家與知識份子極爲擔憂——以 Weber 的「鐵的牢籠」做爲代表，但是來自於另一個歷史傳統——實質合理化，對於自身慾望的承認與表達，讓這樣的擔憂有所緩和。Habermas（1996）也相信西方現代社會的形式合理化的系統將因來自於生活世界實質合理化的穿透而有所調整——降低過份形式合理化的程度。不

過，Habermas 與 Taylor 相較，後者對於兩者所共同認為的現象——形式合理化與實質合理化的相形相剋，做了更深入的歷史分析，將這樣的相形相剋是為西方文明所獨有的歷史或文明的產物，相對而言，Habermas 則只提出了這樣的現象，並未多做解釋。

因此，就 Taylor 而言，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說：社會就是言說而已，或是只要願意遵守真誠性，合理化言說就會誕生。相反地，這有極微複雜的論述。合理化言說的德行——真誠性是一種歷史實踐之後的理性思辨，是西方文明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而非自然本性的純粹理性思辨。社會與言說有莫大的關連，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言說都是社會，所有的言說都可以形成現代社會。任何的人類群體都有語言系統，都有言說，但是並不是會說話的人就一定會形成現代社會！這裡的言說是一種合理化的言說——獨獨首先誕生於西方文明（是否可以移植於非西方文明，到目前為止，依然未得而知，非西方文明正在努力接受與適應），這是一種可以就事論事的言說，而且可以清楚地表達（articulate）內在自我的慾望與利益——這是一種第一人稱的自我內省與表達；同時這樣的合理化言說可以具有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建構，可以建構出社會的形式且實質合理化的整體性（形式合理化的系統或各項社會制度與生活世界相互穿透）；因為既然可以進行第一人稱的內在的、激進的反思，必然有設身處地為他人想的能力與實踐感，因此

也必然是互為主體，最後並朝向整體感發展，不過形式合理化的力量並不會讓實質合理化朝向神秘主義；而實質合理化同時也不會讓形式合理化過份發展，而成爲教條化的「系統」。形式合理化與實質合理化彼此相互穿透，成爲一種自在且自爲的整體。這是一種實踐——歷史實踐，藉由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達到自在且自爲（in itself and for itself）——主體與整體相互對立與相互穿透的合理化狀態。就 Taylor（2004）而言，這是一種歷史實踐的結果（做爲一種存在），成爲西方現代社會想像的共同理解基礎。

Taylor 的社會想像試圖解釋古典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個體與整體的關連——個體如何結合成爲整體，而且個體是否完全被整體宰制而失去自由度。這是古典社會學理論如 Marx、Weber 與 Durkheim 等對於現代社會誕生之際的高度關懷。但是，很可惜當前的社會學都已是爲理所當然，而幾乎不再爭執地，接受了被實證主義化的 Durkheim 社會事實（social fact）的觀點——個體的總和並不等於整體，但是什麼是整體？並未多做解釋，這僅僅是一種假設而已，充其量是用社會想像力來權充解釋，但是並未對社會想像本身做任何解釋。

就台灣而言，我們真的完全認識與理解西方現代社會與公共性的整體性特質以及其誕生過程？社會事實的觀點是唯一看待西方現代社會的觀點嗎？有沒有不同的看法？其實，就西方社會學的傳統而言，實證主義不是唯一個視野，

詮釋學傳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視野，但是已經被嚴重忽視了。這個誤導的始作俑者是 Parsons，他將社會學徹底 Durkheim 化，或是按照蔡錦昌（2005）的說法，Parsons 也將 Durkheim 給實證主義化；不僅如此，Weber 的詮釋學傳統做為古典社會學——與實證主義社會學相對的（幾乎是相對立的）傳統，也被實證主義化或是這麼說：Weber 被 Durkheim 化（王崇名，2006：177-194）。台灣社會學的發展長期以來深受 Parsons 以及學生們的影響，可以說是完全美國化，直到近年才開始有不聲音與看法（葉啓政，2005）。

實證主義社會學的觀點，幾乎不去討論社會的整體性是如何由個體所構成，而是非常肯定地認為「個體的總和並不等於整體」，雖然相信整體的存在性與獨特性，但是也僅僅假設個體的總和並不等於整體，那麼整體到底多出什麼？實證主義社會學未多做解釋，最後是以社會學的理想力來做為理解這個整體的能力。想像力與實證主義之間是水火不容的，實證主義最大的特色就是看到什麼說什麼，沒看到的不多做推測；但是社會學想像力卻是立基於哲學詮釋學的傳統——相信直覺與共通感（或共同理解），而這正是實證主義所難以忍受的。但是很奇怪，實證主義社會學卻直接強立於哲學詮釋學傳統的社會學想像力之上，並對這樣的連結並未多做解釋。這樣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現代社會就是個體的總和再加上那個似乎可以說清楚，但是實際上卻尚未被說清楚的整體本身的特質。現代社會的整體特質與社會學的理想力有莫大